

# 集體行動的整合理論： 理性選擇和心理動機理論<sup>†</sup>

傅恆德\*

## 摘要

爲了瞭解集體政治行動的產生因素，許多集體行動的參與理論嘗試從跨國實証的研究中建立。引用理性抉擇理論的學者用很簡明的成本和收益的原則來說明參與集體政治行動的基礎，給行爲個體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行爲動機。相對剝奪理論指出社會成員感受到的一種被剝奪的社會心理狀態，是參與集體行動的主因。本研究除了驗證理性抉擇模型、和心理動機模型外，試圖結合這兩種理論。一方面注重參與集體政治行爲的心理因素，另一方面也注意參與者的理性基礎。由於剝奪的效果，主要是看它怎麼與人們的態度和客觀的社會情境結合。因此，一個完整的模式應包括理性抉擇和心理動機理論。個人的行動除了受理性的支配外，也直接地受限於客觀的環境因素和主觀的心理因素。從西德和秘魯的資料，以兩個理論就合法和非法的集體行動作實証的分析，得知理性理論和心理理論均被証實，而且有相當的解釋力。雖然理性理論就整體而言，稍比心理理論有解釋力，但是綜合的模型又比兩者來得更具有說服力。因此，在集體行動的研究中，不能單就理性或心理層面來檢討，必須整合兩個理論作全盤的分析，如此才能對集體行動的起源作深入的瞭解。

## 壹、簡介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的發展帶來普及的教育、快速的資訊傳播、都市化和工業化，也因此將主要社會團體動員到政治舞台上。由於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不足，無法將這些需求納入體系中。主要政黨無法彙集整合並表達各方利益，民意因此無法有效地轉化

<sup>†</sup>本研究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的專題研究計劃，NSC 83-0301-H-029-007。曾在國科會「政治學專門專題研究計劃」成果發表研討會中發表，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九、十日，政治大學。會中曾蒙謝復生、黃德福、劉義周等教授提供寶貴的意見，特此申謝。同時，對東海大學學報的兩名匿名審查教授所提的指正，表達謝意。本文如有錯誤，當然，由作者自行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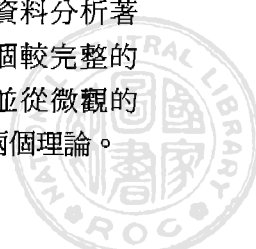
\* 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為政策，普遍的社會挫折感便產生了。這些挫折有政治主張、經濟的訴求、社會文化的不滿等。在個人層面，對政治普遍的疏離感和無力感、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感、甚至於對政府的效能抱持懷疑的態度。現實生活的壓力、經濟上的困境如失業和通貨膨脹、生活品質的降低等，使中下階級的人民無力應付。在團體層面，弱勢團體受到剝削進而以團體行動來抗議、示威以表示其不滿，進而爭取更多的福利。在日趨多元的社會中，政府施政主要用來應付各種團體的壓力與訴求，以回應團體的壓力，長遠的計劃不能確定與執行。行政體系猶如救火，疲於撲滅需求的火花。在社會層面，大量的農村人口伴隨的現代化的腳步擁向城市，傳統的社會連結於焉不存。而新的社會網絡尚未建立，使得這些民衆無所依付。大量的失業或待業的人口在城市周邊過著簡單貧窮的生活，成為潛在的無產階級。經濟的快速成長產生了新的贏家和新的輸家。新的中產階級，除了使這些輸家有相對的被剝奪感外，也從經濟富足轉而爭取較多的政治權力。由於政治系統缺乏溝通管道，使得各類社會團體必須以自力救濟、各類型的集體抗爭和街頭運動來從事政治參與。這種型態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使得行政單位必須面對無數的請願遊行、抗議示威、罷工、甚至暴力武裝衝突。

當致力民主化的政府必須忍受相當時間的「陣痛」和「亂象」時，威權國家則採取斷然的武力鎮壓。兩者皆須付出驚人的社會成本。譬如，民主的崩潰、軍人干政、僧侶參政、農民革命、工人罷工、學生示威等集體參與。進而造成經濟的退步、社會治安的惡化、政經資源的分配不公、政治的不安定等等。因此，對集體政治行為的研究不但成為維持政治安定所必需，也成為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如何將社會的需求和平而有效的納入政治體系中，不但是民主化國家的主要課題，也是民主政治運作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為了瞭解集體政治行動的產生因素，許多參與的理論嘗試從跨國實証的研究中建立。理性理論用很簡明的成本和收益的原則來說明參與集體政治行動的基礎，給行為個體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行為動機。相對剝奪理論指出社會成員感受到的一種被剝奪的社會心理狀態，是參與集體行動的主因。由於理性抉擇理論有「搭便車」的問題，理性的收益必須包括物質和規範性的收益，才能充分解釋集體行動的起源。由於相對剝奪理論在因果關係的建立較為薄弱，心理的因素必須擴大到利他的心理和團體的相對剝奪。本研究結合理性抉擇和心理動機理論，運用實証的跨國資料作檢測，除了驗證理性抉擇模型、和心理動機模型外，本研究試圖結合這兩種理論，一方面注重參與政治暴力的心理因素，另一方面也注意參與者的理性基礎。由於剝奪的效果，主要是看它怎麼與人們的態度和客觀的社會情境結合。因此，一個完整的模型應包括理性抉擇和心理動機理論。個人的活動除了受理性的支配外，也直接地受限於心理因素。從實証的跨國資料分析著手，從文獻的探討和整理，假設的提出，到模型的檢測，本研究意圖建立一個較完整的模型來說明集體政治行動的起源。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對文獻作檢討，並從微觀的研究中釐清理性理論和心理理論的主要論點，並提出一個綜合的模型來整合兩個理論。



## 貳、文獻探討

政治科學家對於集體政治行動的研究，已經有許多研究發現。沙勒 (B. Salert) 指出四個主要的理論：理性抉擇、心理、結構和馬克斯的理論 (1976)。理性抉擇理論著重行為的動機；心理理論強調行為的心理基礎；結構理論著重結構系統平衡的總體條件；馬克斯則強調階級意識乃為行動的根源。其他的理論，我們可分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來說明。在宏觀的研究中，集體暴力的導因有收入的分配不均、土地分配的不均、經濟發展水準、經濟成長、相對剝奪、資源動員、政府型態、民主化水準、鎮壓、分離意識、通貨膨脹、失業率、和世界體系等<sup>(註1)</sup>。毫無疑問的，跨國的社會經濟等資料對於集體政治行動的起源有重大的幫助，然而宏觀的解釋欠缺的是宏觀和微觀間的連結 (Macro-micro Linkage)。因此以微觀的分析，對跨國問卷資料作研究，在建立理論上是不可或缺的。在微觀的方面，目前有關的研究偏重於理性抉擇模式和心理動機兩個方向，從個人的心理的基礎來研究集體行動的起源。有關的文獻可以從理性和心理兩個方面來討論，分述於下：

### 一、理性抉擇理論：

以理性的假設來討論政治行為，在西方文化有很深的傳統。自希臘時代的功利主義者 (Utilitarian) 到霍布斯 (Thomas Hobbes) 以來，均有以理性來討論個人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和個人的行為動機<sup>(註2)</sup>。近來，道恩斯 (A. Downs) 在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一書中提出人是「理性行為者」的假設以理性抉擇理論來解釋政治行為 (1957)。他用成本和收益的原則說明政治參與的基礎，清楚地描述了行為個體一個最基本的行為誘因。然而，Downs 的理論運用在集體行動時卻產生了一個「搭便車」(Free Rider) 的問題。這個問題使得大家對集體行為的可能產生懷疑<sup>(註3)</sup>。由於集體的行動仍然是普遍存在的事實，集體行動的理性理論在應用上必須作一些修正。歐森 (M. Olson) 在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提出「選擇性誘

(註1) 在宏觀的研究中，集體行動的導因已廣泛地被研究。舉其重要者簡單敘述於下：結構的不平衡 (Hibbs Jr., 1973; Huntington, 1968; Deutsch, 1966)；收入的分配不均 (Muller and Seligson, 1987; Muller, 1985; Weede, 1981; Hardy, 1979)；土地分配的不均 (Midlarsky, 1989; Nagel, 1976; Russett, 1964)；經濟發展水準 (Sigelman and Simpson, 1977)；經濟成長 (Yough, 1981; Davies, 1962)；相對剝奪 (Feierabend and Feierabend, 1972; Gurr, 1970; Finkel and Rule, 1986; Davies, 1962)；資源動員 (Tilly, 1978; Gamson, 1975; Snyder and Tilly, 1972; Tilly, 1969)；政府型態 (Weede, 1981)；民主化水準 (Muller and Weede, 1990)；鎮壓 (Lynchbach, 1987; Snyder, 1976; Hibbs Jr., 1973)；分離意識 (Fu, 1990; Hibbs Jr., 1973)；制度化 (Ben-Dor, 1975; Welfling, 1973; Schneider and Schneider, 1971)；通貨膨脹和失業率 (Venieris and Gupta, 1985; Gupta and Venieris, 1981; Gupta, 1977; Snyder, 1975) 等。

(註2) 請參考魯爾 (J. Rule) 所著市民暴力理論《Theories of Civil Violence》第一章。

(註3) 這個問題的產生使集體行動變成不可能。因為一個坐享其成者也可以享受非排他性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同時，由於不參與集體行動無須付出成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理性行為者都期待不勞而獲因而不會參加集體行動，集體行動便無從產生。



因」(Selective Incentive) 嘗試提出理性行為者參與集體行動的理性基礎<sup>(註4)</sup>。他認為要動員潛在團體以進行集體行為，除了經濟的誘因之外，也要能夠提供社會誘因如個人地位、個人心理滿足和回報和團體制裁等(1965:60-61)。這樣的解釋使理性的假設能夠克服搭便車的問題。托拉克(G. Tullock)在其革命行動的兩難《The Dilemma of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書中指出參與集體行動還有其他的輔助收益如「娛樂」(Entertainment) 效果等(1971)。藉由娛樂收益的提出加強集體行動的正面收益以合理化集體行動仍然普遍存在的事實。錫爾(Silver)結合了歐森和托拉克的看法，他將誘因分為物質收益(Material Rewards)和心理收益(Psychic Income)。其中，心理收益包括了對國家、對階級的責任感、民族意識、法律規範、對人道、同胞愛、冒險犯難等(1974)。穆勒(E. Muller)和歐普(K-D. Opp)在對紐約和漢堡兩地居民與學生作實証的研究後，主張除了社會地位、團體認同，個人心理滿足外，致力公共財的提出也是促使個人參與政治暴力行為的原因之一(1986: 481)。芬柯、穆勒和歐普等人(Finkel, Muller, and Opp)則進一步發現個人效能感也影響了個人決定是否參與集體的和平抗爭和暴力行為的動機(1989:885-903)。此外，依哈定(R. Hardin)的建議，動機也必須考慮其他超理性的動機(Extra-rational Motivation)如道德的規範動機(Moral Motivation)(1982: 101-108)等。馬哥利斯(H. Margolis)也指出，每一個人都有兩個自我。一個是自私自利的自我(Selfish Self)，一個是團體的自我(Group Oriented Self)。而理性的動機則在這兩個自我之中(1982)。加上了這些規範性的收益和動機，個人與團體的考量，理性抉擇理論便較為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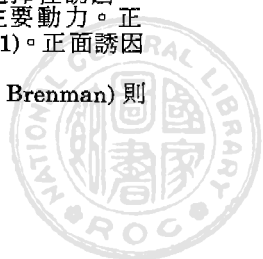
從這些主張中，可以發現這些理性理論支持者致力從模型的建立到實証的分析，其主要的考量是成本與收益。就非法的行動而言，理性抉擇模型的支持者認為集體政治行動是經過理性思考抉擇而產生的行為。有些是反政府，反系統，政治性顯著的集體政治行為，是團體透過集體行動以達成他們認為成本較低而收益較大的團體目標。這種集體行為能帶給團體或成員更多的報償，同時，僅需付出較少的代價。另一方面，就和平的示威遊行罷工靜坐等行為而言，是團體認為經由這些活動可以清楚的表示政治傾向、公共政策的態度、政治利益的表達等，進而影響公共財的分配。

## 二、心理理論：

雖然理性理論解釋似乎可以合理化集體行為，除了上述的一些問題外，許多學者也指出理性本身的問題<sup>(註5)</sup>。心理的理論如相對剝奪便可以補救其不足。以剝奪理論來解釋集體行動的產生是植基於一個很深厚的社會學傳統。馬克斯(K. Marx)的階級鬥爭理論假設受剝削的勞工階級會形成一個強烈的階級意識，並以暴力的集體行動來推翻資本主

<sup>(註4)</sup> 大團體的動員不易，小團體動員較為容易。動員中介團體的主要方法為強化和選擇性誘因。由於集體行動在自發性社團強制是較不常見的，選擇性誘因的提供才是動員的主要動力。正面誘因如個人地位、個人心理滿足和回報等，負面誘因如團體制裁等(1965:60-61)。正面誘因提供了參與者的利益而負面誘因便是增加參與者的成本。

<sup>(註5)</sup> 例如，依耳斯特(J. Elster)指出理性在何時(when)失去說明能力；而布雷門(G. Brennan)則指出了理性本身因何(What)而行不通。



義。葛爾 (Ted Gurr) 也曾提出相對剝奪理論來說明為何人們參加政治暴力的社會心理狀態。他認為相對剝奪乃是社會成員感受到的一種被剝奪的感覺。這種感覺來自對社會的價值期望和價值現實的差距 (1968)。這些成員相信他們應擁有某些權力並享受某些利益，然而現實的社會卻無法提供。這種相對被剝奪的感覺便產生挫折感。而這挫折感便造就了一些暴力行爲。由於這些人的憤怒和不滿是一種心理的現象，也是導至集體行爲的主要因素。當個人對感受到的差距愈大，這些人對社會愈是不滿，參與集體行爲的可能性也相對增加。

誠如戴維斯 (J. Davies) 在較早時所提出的「不可容忍的差距」作為解釋革命的起源 (1962: 6)。他指出長期的繁榮提昇人民的期待的同時也豐富了可以滿足的事物 (Gratification)，但在一個劇烈的衰退時，社會滿足該期待的能力突然減低，差距便會持續擴大到不能容忍，於是革命就產生了。根據這個看法，費爾阿班夫婦與他們的同事 (Feierabend, Feierabend and Nosvold, 1969) 也曾針對需求的滿足和政府的能力間的關係作全盤的檢討。杭庭頓 (S. Huntington) 在變動中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書中提出「差距假設」來說明這一種狀況。他認為經濟發展的水準的高低，社會階層流動員機會 (Mobility Opportunity) 的大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高低，都是造成政治不安定的因素。經濟水準提供物質生活基本條件的滿足；流動機會提供社會階層昇遷和政治參與的管道；政治制度化將所有的政治需求納入政治體系中 (1968)。如果無法提升經濟水準，暢通社會昇遷的管道，制度化政治參與，社會政治的不安定於是產生。

葛爾在相對剝奪方面有深入的分析，他嘗試提出長期和短期的剝奪指標來檢測其與政治暴力的關係。長期指標如經濟歧視、政治歧視、分離主義、對外資依賴、地區性分裂、缺乏受教育機會等；短期指標如通貨膨脹，經濟成長緩慢，對政治參與的新限制，或政府的某些不合理的政策等 (1968)。誠如穆勒和周乾 (Muller and Jukam) 明白的指出：當人民採取市民不服從的行爲或政治暴力的行爲時，他們是對某些事情不滿 (1980:159)。這種不滿便是他們行爲的動機。此外，在拉丁美洲的研究中，米達拉斯基 (M. Midlarsky) 指出土地分配的不平均與所得分配的不均也常被用來測量相對剝奪的程度 (1988)。

這些宏觀的變數，說明了一種團體與團體的不均，以及個人與個人的分配不均產生的不滿的理由。此外，一些總體的變數如平均國民生活所得、平均能源消耗量、貧窮指數、痛苦指數、生活水準等，則說明了客觀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下，當弱勢政治經濟團體常常是受剝削的。就經濟層面來說，倘若貧窮加上失業和通貨膨脹的惡化，極可能導至對整個政治體系的不滿，進而產生暴力行爲。就政治層面來說，基本政治權力被無理的剝奪，民權受到非法的侵害，或是弱勢團體長久的被排除在體系之外都可能昇高不滿的程度。就整體而言，開發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快速的社會動員、大眾媒體的快速傳遞、教育的普及和都市化的衝擊，加速社會比較，受剝削的感覺於是產生社會挫折和不滿。



總之，相對剝奪理論和其他各種理論如革命的差距理論，內在的挫折感理論，和地位的不均衡理論均強調一種基於被剝奪而產生的不滿心理基礎，是參與集體行動的基礎。然而根據歷史的發展與觀察，在艱難的經濟環境不一定會產生集體政治行動。例如，在 1930 年代，全球性經濟不景氣並未帶來較多的集體行動。因此，資源動員 (Resource Mobilization) 理論的支持者主張集體行動的產生主要是組織的動員和權力鬥爭的結果 (Tilly, 1975)。換句話說，心理因素雖然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參與集體行動的心理動機，卻不能忽略組織動員的團體因素和客觀的環境因素。因此，討論心理的因素必須結合兩種理論：一方面注重參與政治暴力的心理因素，另一方面注意限制團體動員的結構性因素。

由於宏觀的理論把分析層次放在系統結構與運作功能上，在理論的建構有其侷限性，必須輔之以微觀的研究分析。在微觀的研究中，參與的動機如挫折導至攻擊、相對剝奪導至集體行動已反覆地被証實。巴恩斯和凱斯 (Barnes and Kaase) 在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一書中明白指出 (1979)。穆勒 (E. Muller) 在攻擊性政治參與《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也有完整的敘述。他指出在國家社會的系統中，決定是否參與的因素主要有四：對政府機關或人員的不滿，個人對政府效能感和政府正當性的減弱，個人相對剝奪感，和個人認為以暴力行動更可以善或有效地達成目標 (1979: 29)。這些因素便包括了心理的不滿、相對剝奪的感受、和理性抉擇等。

## 參、研究架構和方法

### 一、研究的架構

不管是爭取個人的或集體的、利己的或利他的收益，理性行為仍須建立在收益和成本的考量。一般的理性模型的支持者僅就個人的物質收益著眼。由於理性抉擇理論有搭便車等坐享其成的問題，因此理性的模式就必須增加集體收益以解釋集體行動的產生。然而物質收益仍無法說明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m) 者的價值觀和行為<sup>(註6)</sup>，因此必須加上利他的規範性收益。加上這些收益可以使理性模式更為完整。從歐洲各國的研究中，發現了許多文化的變遷和後物質主義的行為的轉變，使我們必須更加重視這個動機。就整體而言，理性模型可以被歸結為個人和集體、利己與利他、物質和規範等收益 (如圖一)。個人物質收益包括因參與行動而得到的物質和金錢收益、過程中的收益 (如情感的發洩和參與的快樂等)、和參與的成本 (即負收益如時間的損失、行動中受傷、被起訴等)。集體收益包括團體的成功 (因而達成團體的目標)、或為了達成團體目標成員必須團結合作的理念 (工作保障等)。個人的道義責任感的滿足如個人的責任感、道德的履行

(註6) 在文化的變遷《Cultural Shift》一書中，英格哈描述了歐州政治文化與政治行為的變遷，同時也提出所謂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m)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區分以說明不同的參與動機和理想。



和個人的信仰的完成等。集體的道德則包括因應他人期待、團體鼓勵讚許、和公共財的提供等。個人的利他主義是偏狹的個人人際關係，如同儕的利益、應朋友的請託等。集體的利他行為是廣泛的，如政策的考量和公共財的提供、提供其他團體的利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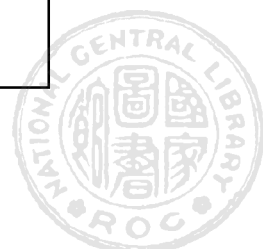
圖一：理性模式

	利己物質	利他行為
個人考量	物質和金錢收益 過程中的收益 (如發洩和娛樂) 成本(負收益)	利他(同儕)主義 因應朋友之認同
集體考量	團體的成功 同儕壓力 團結合作的理念	提供公共財 提供(主張)其他 團體公共或私有財

另一方面，擴展後的心理理論，可以從個人和集體的的心理層面，來考量個人相對剝奪和道德與責任。就就整體而言，心理模型可以用下列圖示表示(如圖二)。除了個人的參與的心理滿足外，加上對其心理的投入和政治的興趣。團體的相對剝奪感可以從收入是否比應得的要來的少(收入的剝奪)，或是生活水準比應得的低。在道德責任的滿足方面，個人的考量包括個人責任感、個人的道德觀念及其履行、個人信仰的實踐等。在集體考量方面，因應他人的期待或團體鼓勵和讚許等也是主因。換言之，相對剝奪是指個人主張；道德與責任感則是指團體的主張。

圖二：心理模式

	相對剝奪心理	道德與責任滿足
個人考量	心理收入 政治投入	個人的責任感 道德的履行 為個人信仰參與
集體考量	團體被剝奪 收入被剝奪 生活被剝奪	因應他人期待 團體鼓勵讚許 責任感



本研究結合這兩種理論，一方面注重參與集體政治行動的心理因素，另一方面也注意成員的理性行爲。最基本的假設是集體政治參與者面對相對剝奪環境來作理性抉擇。誠如葛爾明確地指出：所謂「剝奪…的效果，端看它是怎麼的溶入並刻劃人們的態度和周圍的社會情境」(Gurr, 1970: 142)。由於這些不滿份子是最利益的追求者，他們可得的利益完全決定在他們的心理狀態以及他們對客觀的環境作的理性抉擇。心理的不滿、挫折、和相對剝奪感是行爲的動機；理性的抉擇是行爲的基礎。一個完整的模型應包括理性抉擇和心理動機理論。每一個個人的活動除了理性的考量外，也直接地受限於客觀的環境和心理因素。因此，本研究結合了兩個理論，提出綜合模型來解釋合法和非法的集體行動(請參考圖三)。

## 二、資料的取得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選定穆勒和他的同僚在一九九〇年所主持的四國(以色列，秘魯，西德，美國)跨國研究中取得秘魯和西德的兩個集體政治行動的資料檔作檢測和深入的分析(註7)。在這一個研究裡，就部份的模型和綜合的模型以跨國分析的資料作有系統的分析。內容包括：(1)分別以兩個主要理論為主對跨國資料作全盤的分析和檢測，(2)檢測所提出的模式，和(3)比較三個模型的解釋力。由於迴歸分析的統計程序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控制方法，我們便將理性和心理理論的主要變數放在同一個方程式中，用以檢測並篩除虛假和重覆解釋的關係。

## 三、主要變數的測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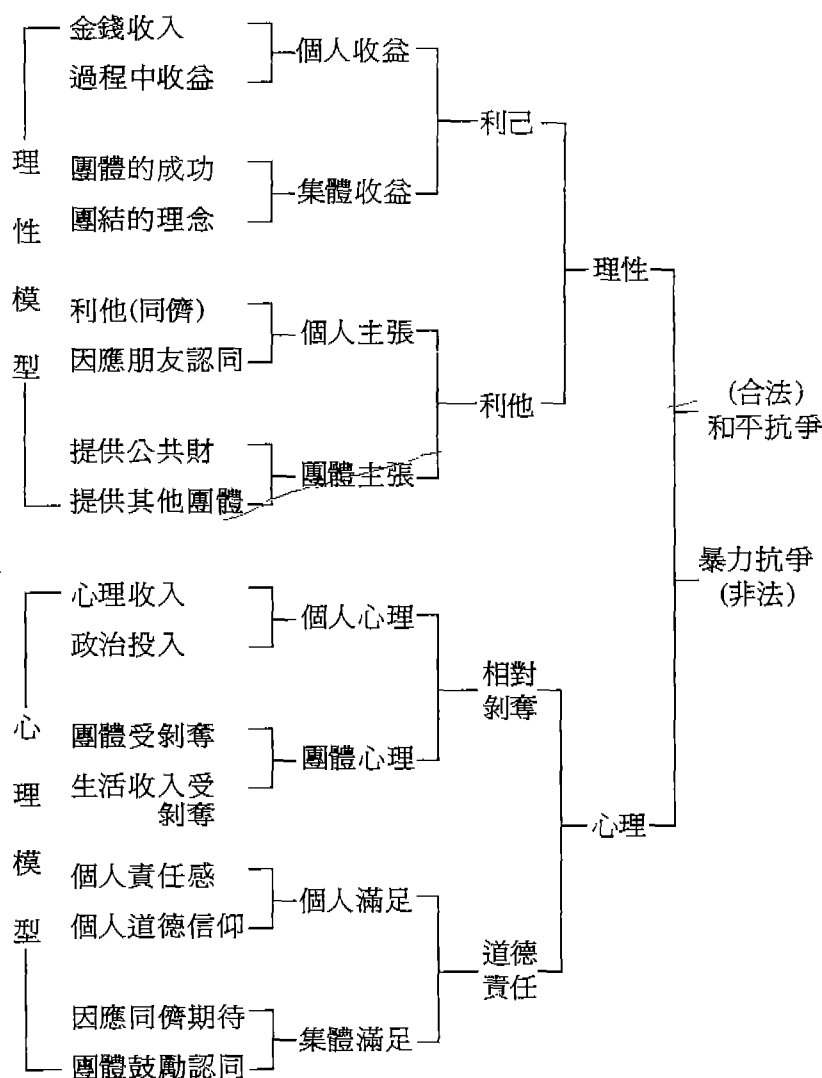
(一)在本文中所要解釋的兩種現象爲合法的和非法的集體行爲。在一連串的問題後，爲了增加資料的信度和保障受測者的私密，該部份的問卷是由受訪者自行填寫並加以密封。基本上有兩大類：一是詢問參與各項合法的行動(如參與助選、請願、抗議示威、參加政治集會等)和非法的的行動(如佔領建築物、破壞公共秩序、毀損公物等)的可能性。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受測者是否非常可能、可能、不大可能、或絕對不可能進行上述各項行動。另一類則是詢問受訪者在過去是否經常、曾經、或從不參與前述各項活動。綜合各項行動的過去參與經驗和未來參與的可能性作加權，以求得參與合法和非法的行動的強度作爲依變數。換句話說，曾經參與某些特定的活動而且(在未來)可能參與該項活動的人分數最高；不曾參與而且在未來也絕對不可能參與的人分數最低。

合法的和平合法抗爭包括簽署請願、參與許可的示威、佩戴政治標幟、參與市民行動團體、和收集請願簽名等。非法的抗爭行動包括參與非法示威、佔領建築工廠學校或政府機關、與警察或其他權威當局對峙、破壞財物如打破玻璃推翻拒馬或燒毀汽車、非法抗議罷工行動、與其他團體或個人對峙、佔領建築、和阻斷交通等。先以參加的可能性大小作加權再計算其總分，便是被解釋項(依變數)；合法和非法的集體行動指標。由於項目很多，爲了去除極端值，以對數轉換以去除極端值，改善其分配。

(註7) 藉此機會感謝穆勒和其他教授讓本人參與這項研究，並應允本人使用他們的資料。



圖三：集體行動的整體模式



(二) 理性考量的主要指標是從許多問題中產生，是由詢問受訪者是否因為參加合法(或非法)的集體行動而在物質或心理的收入。其主要指標如下：

- (A) 利己個人：詢問受訪者是否由於參與而有金錢的收入或因此而對工作有幫助，或有時間上的損失。過程中收益如因為參與活動而感覺到快樂，或在參與時覺得應該適時發洩、或可因此而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 (B) 利己團體：詢問受訪者是否在過去團體的行動而有正面或負面的成果，參與是否基於團結的信念，畢竟每個個人都應為團體努力團體才會成功。

(C) 利他個人：由於認為參與可以影響政策才使一個個人參與集體行動，同時也可以得到朋友的認同。

(D) 利他團體：在政策上的不滿意，爲了提供公共財(爲了制定好的政策)或替政黨或候選人工作以達到影響政治的目標。

(三) 心理動機的主要指標可從下列所列的自變數中觀察：

(A) 個人心理：是指個人的政治投入和心理的收入。心理收入是指因爲參與而感到快樂；政治的投入是指對政治的興趣和是否常與別人討論政治。

(B) 團體心理：團體的相對剝奪，是由收入和生活的相對剝奪感加總而來。是指詢問受訪者是否覺得個人收入和生活水準是否與自己所應得的不成比率。

(C) 個人滿足：參與集體行動是否由於團結信念和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D) 團體滿足：參與集體行動是否由於可以獲得別人對團體的讚同。

## 肆、實証的分析

一個好的理論要能接受重覆的測試，方能得知其強健性；要能以相關的變數或理論來控制方能証實其關係的非虛假性；要能從跨國的資料中比較分析才能說明其普遍性。在這一箇研究中，以西德和秘魯的資料來檢測集體行動的三個可能的理論：集體行動的理性模型、集體行動的心理模型、以及綜合理性與心理的模型分別來討論合法和非法的集體行動。首先以簡單相關分析來檢合理性理論與合法和非法的集體行動的關係，再以心理理論作相同的分析。其次，以複迴歸的方法來分析理性和心理理論及其跨國的差異。最後，以複迴歸將兩個理論的主要變數結合以檢証綜合的理論。

### 一、簡單相關分析

在這一箇分析中，理性理論的變數以四組的方式來表列：利己個人、利己團體、利他個人、和利他團體。利己個人包括金錢收入、工作利益、時間損失、快樂和發洩等。利己團體包括過去團體的努力是否有正面或負面的結果和個人是應該爲團體成功而努力。利他個人如參與合法集體行動可以影響政治決策，而且周圍的朋友的認同態度。利他團體如替候選人或政黨工作，公共政策的不滿意等四組並以之與合法和非法的集體行動作相關分析。就合法的行動，從西德的資料中，各變數均爲顯著。我們可以看出除了利己個人的四個變數外，其他三項都有較高的相關係數和顯著的關係：利己團體 ( $r=0.33$  和  $r=0.44$ )，利他個人 ( $r=0.45$ ,  $r=0.38$ )，和利他團體 ( $r=0.35$ ,  $r=0.47$ )。在秘魯的資料中，利己個人只有快樂的變數有較高的相關係數 ( $r=0.27$ )，其他都在 0.2 以下。而利己團體也僅有 0.20 左右的相關。利他個人有較高的相關係數 ( $r=0.20$ ,  $r=0.39$ )，爲候選人

工作也有0.34。比較不尋常的差異是在物質收益，在秘魯參與集體行動有正面的物質收益 ( $r=0.13$ )，如工作與金錢收入等。反之，在西德卻有損失( $r=-0.09$ )。在參與的快樂方面，秘魯也遠高於西德。在政策的滿意方面，西德有最高的相關 ( $r=0.47$ ) 而在秘魯卻是不顯著。請參考表一。

表一：合法集體行動與理性模型：簡單相關

	合法集體行動	
	西德	秘魯
[利己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9**	.13**
時間的損失	-.11**	-.17**
參與的快樂	.09**	.27**
參與的發洩	.27**	.14**
[利己團體]		
過去團體行動的成果	.34**	.20**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44**	.21**
[利他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45**	.20**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38**	.39**
[利他團體]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會影響政治	.35**	.34**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47**	-.03
樣本數	1709	1584

註：數字代表簡單相關係數。\*\*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1$

在非法的集體行為方面，在利己個人有兩個增加的指標，一是參與非法的行動會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會更瞭解政治。基本上，與合法的行為有相同的模式。在利己個人層面，政策影響力、周圍朋友的態度中有較高相關。西德的相關係數是 ( $r=0.46$  和  $r=0.38$ ) 而秘魯則是 ( $r=0.33$  和  $r=0.33$ )，詳見表二。



表二：非法集體行動與理性模型：簡單相關

	合法集體行動	
	西德	秘魯
[利己個人]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7**	.09**
時間的損失	-.09**	-.06
參與的快樂	.19**	.17**
參與的發洩	.21**	.09**
會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26**	.10**
會更瞭解政治	.26**	.09**
[利己團體]		
過去團體非法行動的成果	.36**	.24**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16**	.07**
[利他個人]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46**	.33**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38**	.33**
[利他團體]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會影響政治	.24**	.24**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36**	-.01
樣本數	1709	1584

註：數字代表簡單相關係數。 \*\*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1$

從表一和表二理性抉擇的模式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國在相關的強度上有明顯的差異。此外，秘魯在利己方面有相對較高的相關；西德則在利他方面有較高的相關。這種差異可以反應出班費德 (E. Banfield) 的觀察，他曾指出義大利南部小鎮的「與道德無關的家庭主義」(Amoral Familism) 來說明落後地區的利己物質的傾向 (1958)。秘魯符合這種文化特質中的利己傾向。

在心理模型方面，西德在合法的集體行動顯現出較強的相關，尤其是在利己個人和利他集體有較高的相關。一般而言，比秘魯要高出許多。在西德，他人的看法 ( $r=0.50$ ) 遠超過秘魯 ( $r=0.29$ )。而秘魯在相對剝奪感 ( $r=-0.06$ ) 和政治效能 ( $r=-0.01$ ) 方面卻沒有顯著的相關，詳見表三。



表三：合法集體行動與心理模型：簡單相關

	合法集體行動	
	西德	秘魯
[個人心理]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心理的收入	.31**	.20**
政治的投入	.44**	.41**
對政治的興趣	.46**	.37**
討論政治的興趣	.26**	.29**
[團體心理]		
團體的相對剝奪	.28**	.15**
收入的相對剝奪	.13**	.15**
生活的相對剝奪	.09**	.06
[個人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在團結的信念	.35**	.20**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25**	-.06
[團體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50**	.29**
樣本數	1709	158

註：數字代表簡單相關係數。\*\*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1$

在非法的集體行動方面，就相關係數而言，西德仍比秘魯高出許多。西德在利他個人有較高的係數：認為屬於道德規範 ( $r=0.53$ )，認為非法行為有時是可以的 ( $r=0.49$ )，政治效能和認同 ( $r=0.36$ )。在利己個人方面有心理的收入 ( $r=0.36$ )；在利他團體別人的讚同與看法也有相當的相關 ( $r=0.45$ )。在秘魯則普遍較低，而且在效能感方面上是不顯著的 ( $r=0.05$ )，詳見表四。

總之，這些行為的差異符合英格哈 (R. Inglehart) 在寧靜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書中的發現。他指出了「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文化在行為上的差異(註8)。根據他的主張西德較靠近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秘魯則較靠近物質主義的價值觀。

(註8) 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的差異在集體行動的標的有所不同。



表四：非法集體行動與心理模型：簡單相關

	合法集體行動	
	西德	秘魯
[個人心理]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心理的收入	.36**	.14**
政治的投入	.23**	.23**
對政治的興趣	.26**	.23**
討論政治的興趣	.11**	.12**
[團體心理]		
團體的相對剝奪	.22**	.13**
收入的相對剝奪	.17**	.10**
生活的相對剝奪	.16**	.07*
[個人滿足]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是符合道德規範的	.53**	.25**
有時是可以的	.49**	.21**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36**	.05
[團體滿足]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45**	.27**
樣本數	1709	1584

註：數字代表簡單相關係數。\*\*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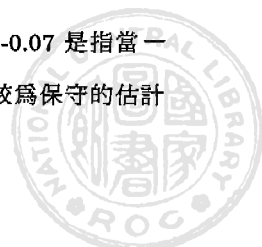
## 二、理性理論的迴歸分析

以理性理論來解釋合法和非法的集體行動，固然可以用相關分析指出各解釋變項和行動的關係。然而一個好的模型必須要能透過控制變數以証實其非虛假性。迴歸分析便提供了這一個統計的優點，不但可以檢測個別變數也可以同時控制其他變數。這樣真實的關係便可以顯現出來。

在理性模型方面，首先以西德的資料來檢測參與合法的集體行為。除了利己個人有四個變項外，其他三組各有兩個。在多變項的複迴歸分析中，對合法行動部份，發現除了利己個人中有兩項是不顯著外，其餘均為顯著。就其相對的重要性而言，利他個人和利他團體有較高的 T 值。在利己個人方面，時間的損失可能會減少參與合法行動(註9)。而過程的快樂則有正面的影響，這發現和托拉克(Tullock)所指出的娛樂效果是一致的。整體模型的解釋力為  $R^2=0.42$  (adjusted R square)(註10)。換句話說，就參與合法集體行動的解釋而言，有百分之四十二的總變異量可用理性模型來解釋。

(註9) 時間損失的效果有負效果是可以從尚未標準化的 b 值來說明。在這一個例子，-0.07 是指當一個單位的時間損失的考量，便會減少0.07參與合法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註10) 調整後的 R 平方是以依變數的數量和觀察的樣本數來作調整，藉以得到一個較為保守的估計。因此，不會因為增加變數的數量而增加解釋力。



其次，就非法的集體行為而言，金錢或工作的收益、情緒發洩和替政黨或候選人工作是不顯著的。最大的解釋來自利他個人，也就是可以影響政治決策。這和合法的集體行為是一致的。其他指標如政策滿意度也有相當的高的T值。總之，就整體模型的解釋力為 0.31，較合法集體行動的迴歸分析相比就低了許多。

表五：集體行動的理性模型迴歸分析：西德

	合法集體行動		非法集體行動
常數	-0.29 (-10.31)***	常數	-0.09 (-6.96)***
[利己個人]		[利己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002 (0.18)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003 (0.60)
時間的損失	-0.07 (-3.75)***	時間的損失	-0.02 (-2.08)*
參與的快樂	0.04 (7.60)***	參與的快樂	0.0009 (0.29)
參與的發洩	-0.02 (-0.45)	參與的發洩	0.0002 (0.07)
		會更瞭解政治	0.02 (4.21)***
[利己團體]		[利己團體]	
過去團體行動的成果	0.18 (5.82)***	過去團體非法行動的	0.08 (5.40)***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0.08 (2.85)**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0.01 (0.76)
[利他個人]		[利他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參與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0.20 (8.76)***	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0.17 (8.60)***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0.07 (9.83)***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0.002 (0.14)
[利他團體]		[利他團體]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	0.05 (2.03)*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	-0.003 (-0.14)
會影響政治		會影響政治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0.02 (12.31)***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0.005 (6.56)***
N	1709		1709
Adjusted R square	.42		.31

註：數字代表尚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括弧內的數字是T值。\*\*\*代表P < .001，\*\*代表P < .01，\*代表P < .05。



就秘魯而言，在合法的集體參與理性模型，四個部份除利他個人的兩個指標外，其他各項都有顯著和不顯著的指標。顯著的有時間的損失、快樂、過去團體集體活動的成果、影響決策、和替政黨或候選人工作會影響政治。關係不顯著的有金錢收入、工作上有幫忙、發洩、團結理念和政策不滿意等。雖然四組中均有顯著的變數，整體的模型仍然維持，但是模型的解釋力比西德差 (adjusted  $R^2=0.25$ )。

表六：集體行動的理性模型迴歸分析：秘魯

	合法集體行動		非法集體行動
常數	0.07 (1.83)	常數	0.02 (0.54)
[利己個人]		[利己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014 (1.36)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008 (0.98)
時間的損失	-0.12 (-3.93)***	時間的損失	-0.02 (-0.92)
參與的快樂	0.03 (4.32)***	參與的快樂	0.02 (3.97)***
參與的發洩	0.009 (1.33)	參與的發洩	0.01 (2.41)*
		會更瞭解政治	-0.004 (0.63)
[利己團體]		[利己團體]	
過去團體行動的成果	0.096 (3.36)***	過去團體非法行動的	0.10 (5.02)***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0.05 (1.52)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0.02 (0.92)
[利他個人]		[利他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參與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0.11 (4.18)***	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0.15 (5.98)***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0.08 (11.09)***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0.05 (7.55)
[利他團體]		[利他團體]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	0.17 (7.68)***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	0.04 (2.40)*
會影響政治		會影響政治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0.0003 (0.27)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0.0005 (-0.57)
N	1548		1584
Adjusted R square	.25		.19

註：數字代表尚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括弧內的數字是T值。\*\*\*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1$ ，\*代表 $P < .05$ 。



其次，非法的集體行動如同合法，四個部份都有顯著和不顯著的指標。時間上的損失不再是顯著，而參與的發洩卻是顯著的。也就是說參與非法的集體行動是為了要舒解平日積壓的忿怒，這點與西德的現象非常不同。基本上，非法的模型與合法的模型大同小異，顯著的項目也約略相同。其模型的解釋力亦低於西德(adjusted  $R^2=0.19$ )。

綜觀理性理論的模型，其解釋合法的集體行為要比解釋非法行為來得強。對西德集體行動的解釋要比對秘魯的解釋又要來的有說服力。

### 三、心理理論的迴歸分析

在心理理論，提出了四組變數，個人心理、團體心理、個人滿足、和團體滿足。個人心理包括心理的收入和政治投入的程度；團體心理有團體的相對剝奪感；個人滿足包括個人主張團結的信念和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團體滿足則為別人的讚同與看法。首先，就西德的例子來討論。在合法的集體行動而言，每個指標都是顯著的。其中以利己個人的政治投入和心理投入以及利他個人中的團結信念最為明顯。利己團體的相對剝奪也相當突出。就整體而言，其解釋力為 0.40。其次就非法的集體行動而言，各項指標均為顯著，而規範的價值(為了政治目的有時可以用非法的手段)最為突出。其影響參與非法行為的可能性也最大。他人的期待則次之，而政治投入則又次之。從非法與合法行動兩者來作比較時，我們可以發現從事合法集體行動者多為政治熱心、主動參與者居多；從事非法集體行動者則受規範性價值所左右。那些認定自己有義務、有責任出來為社會作些什麼的人，傾向於有較強的程度參與非法的行動。

以心理理論來解釋合法和非法的集體行動，其解釋力在合法行動上較強，在非法行動上較弱 ( $R^2=0.36$ )，但就模型的吻合來說也令人滿意，詳見表七。

如同理性理論一般，秘魯的資料在心理理論方面有較小的解釋力。此外，在合法與非法的集體行動，除了疏離感是不顯著的外，其他的指標均為顯著。首先，就合法的行動而言，較大的說明能力與西德相同仍在政治投入與他人期待。其次，在非法方面，政治投入、規範價值、和他人期待三者均有相當的顯著水準。美中不足的是解釋力稍為低落，在合法的集體行動是  $R^2=0.23$ ，非法行動則為  $R^2=0.16$ ，詳見表八。

### 四、綜合模型的迴歸分析

在整合的綜合模型中，理性和心理理論的指標被安置在同一個迴歸方程式 (Equation) 中，如此便能剔除重覆解釋的指標。因此兩個理論，各有四組變數，共十六個變數(註11)。

就西德的資料而言，首先檢查合法的集體行動。雖然有六個指標是不顯著的，但在八項中每項均仍有顯著的指標，亦即在圖三所勾劃出的模型仍是得到証實。至於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我們雖然未列出標準化後的  $\beta$  值(即 Beta)，但也可以從 T 值約略看出。周圍朋友的認同、政策不滿的程度、心理的收入、政治的投入、和參與的快樂等有較高的 T 值。就總解釋力而言，綜合模型有相當強的解釋力 (adjusted  $R^2=0.49$ )。

(註11) 其中理性理論「利己個人」有四個指標，而在心理理論中的「利己團體」和「利他團體」則各只有一個指標。



表七：集體行動的心理模型迴歸分析：西德

	合法集體行動		非法集體行動	
常數	-0.30	常數	-0.16	
	(-9.14)***		(-9.00)***	
[個人心理]		[個人心理]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心理的收入	0.15	心理的收入	0.06	
	(6.87)***		(5.29)***	
政治的投入	0.02	政治的投入	0.004	
	(12.77)***		(5.91)***	
[團體心理]		[團體心理]		
團體的相對剝奪	0.01	團體的相對剝奪	0.005	
	(6.04)***		(4.75)***	
[個人滿足]		[個人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在團結的信念	0.14	爲了政治目的有時可以	0.20	
	(7.03)***	用非法的方法	(12.23)***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0.04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0.02	
	(4.74)***		(4.19)***	
[團體滿足]		[團體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0.07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0.03	
	(3.11)***		(9.34)***	
N	1709		1709	
Adjusted R square	.40		.36	

註：數字代表尚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括弧內的數字是 T 值。\*\*\*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1$ ，\* 代表  $P < .05$ 。



表八：集體行動的心理模型迴歸分析：秘魯

	合法集體行動		非法集體行動
常數	-0.19 (-0.52)	常數	-0.12 (-4.84)***
[個人心理]		[個人心理]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心理的收入	0.17 (6.10)***	心理的收入	0.07 (3.50)***
政治的投入	0.02 (14.37)***	政治的投入	0.009 (8.19)***
[團體心理]		[團體心理]	
團體的相對剝奪	0.008 (3.30)***	團體的相對剝奪	0.007 (3.87)***
[個人滿足]		[個人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在團結的信念	0.06 (3.28)***	爲了政治目的有時可以 用非法的方法	0.15 (8.08)***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0.009 (-1.58)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0.006 (1.43)
[團體滿足]		[團體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0.04 (7.51)***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0.05 (8.64)***
N	1584		1584
Adjusted R square	.23		.16

註：數字代表尙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括弧內的數字是 T 值。\*\*\*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1$ ，\* 代表  $P < .05$ 。

其次，檢測非法的集體行動。規範的價值、朋友的認同、別人的讚同、可以影響決策等有較高的 T 值，心理的收入、政治的投入、和參與的發洩、和政治效能認同感有較低但爲顯著的 T 值，金錢工作的收益、快樂、團結原則、爲政黨和候選人工作、別人的讚同與看法均爲不顯著。就整體而言，解釋力有 ( $R^2 = 0.40$ )，詳見表九。



表九：集體行動的綜合模型迴歸分析：西德

	合法集體行動		非法集體行動	
理性模型：				
常數	-0.43 (-11.16)***	常數	-0.15 (-7.54)***	
[利己個人]		[利己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01 (1.00)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002 (0.22)	
時間的損失	-0.02 (-0.92)	時間的損失	-0.0001 (-0.11)	
參與的快樂	0.03 (5.28)***	參與的快樂	-0.003 (-1.05)	
參與的發洩	-0.009 (-1.87)	參與的發洩	-0.005 (-1.96)*	
[利己團體]		[利己團體]		
過去團體行動的成果	0.11 (3.70)***	過去團體非法行動的	0.04 (2.61)**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0.02 (0.78)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0.005 (-0.36)	
[利他個人]		[利他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參與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0.12 (4.95)***	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0.10 (5.44)***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0.07 (9.24)***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0.03 (6.76)***	
[利他團體]		[利他團體]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	0.02 (0.89)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	0.007 (0.62)	
會影響政治		會影響政治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0.009 (6.99)***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0.001 (1.81)	
心理模型：				
[個人心理]		[個人心理]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心理的收入	0.13 (6.08)***	心理的收入	0.05 (3.74)***	
政治的投入	0.01 (7.39)***	政治的投入	0.003 (4.19)***	
[團體心理]		[團體心理]		
團體的相對剝奪	0.007 (3.60)***	團體的相對剝奪	0.004 (4.10)***	
[個人滿足]		[個人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在團結的信念	0.02	為了政治目的有時可以	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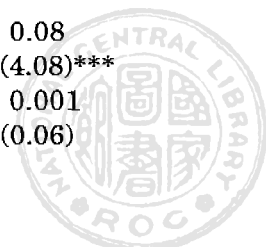
	(0.78)	用非法的方法	(9.07)***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0.02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0.01
	(2.13)*		(2.23)*
[團體滿足]		[團體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0.04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0.02
	(7.44)***		(6.61)***
N	1709		1709
Adjusted R square	.49		.40

註：數字代表尚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括弧內的數字是 T 值。\*\*\*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1$ ，\* 代表  $P < .05$ 。

秘魯的資料顯示較低的解釋力。在合法的集體行動方面，如同在西德的例子，金錢工作收入、快樂、發洩、團結原則、政策不滿、和疏離感是不顯著的，但在八組中均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顯著指標。即使剔除不顯著的指標，在圖三的綜合模型依然得到支持。只可惜解釋力較西德為低，調整後的  $R^2$  只有 0.33。其次，就非法的集體行動而言，與西德相同，心理理論的一些指標顯現出較為強勁的解釋力。雖然在分項迴歸時心理理論好像比心理理論更強的說明能力，一但放在同一個方程式，少數指標因而從顯著變為不顯著。如同在西德一樣，在非法集體行動方面有較低的解釋力 ( $R^2=0.24$ )。

表十：集體行動的綜合模型迴歸分析：秘魯

	合法集體行動		非法集體行動
理性模型：			
常數	-0.08 (1.65)	常數	-0.15 (-4.01)***
[利己個人]		[利己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006 (0.62)	工作和金錢的收入	-0.0002 (-0.03)
時間的損失	-0.08 (-2.81)**	時間的損失	-0.007 (-0.37)
參與的快樂	0.01 (2.06)***	參與的快樂	0.01 (2.74)**
參與的發洩	0.005 (0.88)	參與的發洩	0.008 (1.91)
[利己團體]		[利己團體]	
過去團體行動的成果	0.07 (2.71)**	過去團體非法行動的	0.08 (4.08)***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0.02 (-0.56)	個人應該為團體努力	0.001 (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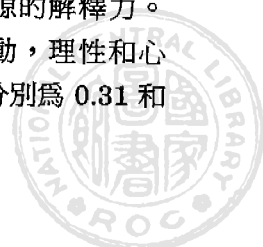


[利他個人]		[利他個人]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參與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0.06 (2.85)**	可以影響政治決策	0.12 (4.89)***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0.07 (9.59)***	周圍朋友態度的認同	0.05 (6.45)***
[利他團體]		[利他團體]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	0.14 (6.40)***	替候選人或政黨作事	0.03 (1.51)
會影響政治	-0.0003 (-0.23)***	會影響政治	-0.001 (-.23)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對政策不滿的程度	
心理模型：			
[個人心理]		[個人心理]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心理的收入	0.11 (4.11)***	心理的收入	0.06 (2.81)**
政治的投入	(11.06)***	政治的投入	0.008 (6.63)***
[團體心理]		[團體心理]	
團體的相對剝奪	0.006 (2.76)**	團體的相對剝奪	0.006 (3.78)***
[個人滿足]		[個人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在團結的信念	0.05 (2.57)**	為了政治目的有時可以 用非法的方法	0.09 (4.81)***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0.002 (-0.39)	政治的效能感和認同感	0.009 (2.19)*
[團體滿足]		[團體滿足]	
[參與合法集體行動]		[參與非法集體行動]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0.02 (3.08)**	別人的讚同與看法	0.02 (3.69)***
N	1584	N	1584
Adjusted R square	.33	Adjusted R square	.24

註：數字代表尚未標準化的迴歸係數，括弧內的數字是 T 值。\*\*\*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1$ ，\* 代表  $P < .05$ 。

## 伍、結論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比較三種模型，以確認它們對集體行動的起源的解釋力。就理性或心理模型而言，其綜合解釋力的差別不大。在西德合法的集體行動，理性和心理的解釋力分別為 0.42 和 0.40。非法的集體行動，理性和心理的解釋力分別為 0.31 和



0.36。在秘魯合法的集體行動，理性和心理的解釋力分別為 0.25 和 0.23。非法的集體行動，理性和心理的解釋力分別為 0.19 和 0.16。就兩個模型而言，西德合法集體行動側重理性動機，而非法則側重心理；秘魯的合法和非法均重理性。若從結合兩種模型而言，綜合模型在西德解釋合法和非法行動分別為 0.49 和 0.40；在秘魯則為 0.33 和 0.24，詳見表十一。綜合模型在調整後的 R Square 上增加了 0.04 到 0.10 的解釋能力。這種增加並不是瑣碎的 (Trivial)，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綜合模型優於個別的模式。

表十一：集體行動三種模型解釋力的比較

	西德		秘魯	
	合法	非法	合法	非法
理性模型	.42	.31	.25	.19
心理模型	.40	.36	.23	.16
綜合模型	.49	.40	.33	.24
理性－心理	.02	-.05	.02	.03
綜合－理性	.07	.09	.08	.05
綜合－心理	.09	.04	.10	.08

註：數字代表調整後的 R square (即可解釋的變異量)。

此研究發現與可能的貢獻可以分別從理論的建構和政策建議兩方面來討論。由於我國面臨一個轉型的局面，除了在理論的架構和實證的資料檢測外，從對其他國家的瞭解，可以提供一個可循的方向。在這一個研究中，我們從西德和秘魯來研究有兩個積極的意義：(一) 本研究可以充實本土研究的基礎，如模型的建立和檢測的方法。由於本研究結合理性抉擇和心理動機理論，運用實證的跨國資料作檢測，除了驗證政治文化、理性抉擇模式、和心理動機模式外，建立了一個更完整的模式，更能夠清楚地解釋集體行動的產生。在對實證資料的分析與觀察中，我們發現理性理論與心理理論的綜合模型比二者更能解釋集體行動的起源。(二) 由於合法的或非法的集體政治行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發展中的國家對於其起因之瞭解與解釋具有高度的政策性。當我們邁向已開發行列的過程中，我國的發展程度約在兩國之間，因此在考量集體行動的起因可從兩者之現況研究得一個參考，在將來的本土素材的研究可以從這一個新的方向來研究。除了加強資料的搜集外，在方法上也可以用更嚴謹的結構程式來描述理性和心理理論互動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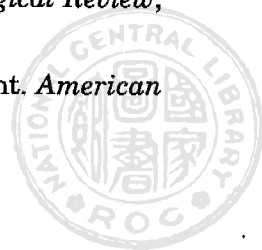
## REFERENCES (參考文獻)

### Book (書籍)

- Barnes, S. M. and Kaase, M.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amson, A. William.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 Gurr, T. R.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 R. (1982)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 Hibbs, D. P. Jr. (1973) *Mass Political Violence: A Cross-National Causal Analysis*. New York: Wiley.
- Huntington, S.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Ingelhart, R. (1990) *Culture Shif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uller, E. N. (1979) *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ule, J. (1988) *Theories of Civil Violence*, Berkeley,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Salert, B. (1976) *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ies*, New York: Elsevier.
-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Boston: Addison and Wesley.
- Welfling M. (1973)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frican party 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 ARTICLES (期刊)

- Ben-Dor, G. (1975)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nceptual an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 309-325.
- Davies, J. C. (1962)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5-19.
- Deutsch, Karl W. (1961)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493-514.



- Feierabend, I., Feierabend, R. and Nesvold, B. (1969)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Violence: Cross National Patterns, in Hugh D. Graham and T. Gurr (eds.)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New York: Signet Books.
- Finkel, E. S., and Rule, J. B. (1986).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Related Psychological Theories of Civil Violence.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9, 47-69.
- Finkel, S., Muller, E. and Opp, K-D. (1989) Personal Influence, Collective Rationality, and Mass Politica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885-903.
- Gupta, D. K. and Venieris, Y. P. (1981) Introducing New Dimensions in Macro Models: The Socio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9, 31-58.
- Gurr, T. R. (1968) A Causal Model of Civil Strif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Using New Indi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 1104-1124.
- Gurr, T. R. (1973) The Revolution-Social-Change Nexus: Some Old Theories and New Hypotheses. *Comparative Politics*, 5, 359-92.
- Hardy, M. (1979) Economic Growth, Distributional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5, 209-27.
- Lichbach, M. I. (1987) Deterrence or Escalation: The puzzle of Aggregate Studies of Repression and Diss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1, 266-97.
- Muller, E. N. (1988)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50-68.
- Muller, E. N. and Seligson, M. A. (1987) Inequality and Insurgen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425-51.
- Muller, E. N. and Jukam, T. O. (1980) Discontent and Agg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980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August 28-31, 1980.
- Muller, E. N. (1985) Income Inequality, Regime Repressivenes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47-61.
- Muller, E. N. and Opp, K-D. (1986) Rational Choice and Rebellious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71-89.
- Muller, E. N. and Weede, E. (1990)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Politic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4, 624-51.
- Nagel, J. H. 1976. Erratum. *World Politics*, 28, 315.



- Russett, B. (1964)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The Relation of Land Tenure to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6, 442-54.
- Sigelman, L. and Simpson, M. (1977) A Cross-National Test of the linkage between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1:105-28.
- Silver, M. (1975)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 An Economic Approach. *Public Choice*, 17, 63-71.
- Schneider, P. R. and Schneider, A. L. (1971) Social Mobilizat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 69-90.
- Snyder, D. (1976)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al Coercion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Military Sociology*, 4, 277-293.
- Snyder, D. and Tilly, C. (1972)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1830-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520-32.
- Tilly, C. (1969) Collective Violence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H. D. Graham and T. R. Gurr (eds.)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4-42.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June 1969. New York, Signet Book.
- Tullock, G. (1971) 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11, 89-99.
- Weede, E. (1981) Income Inequality, Average Income, and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5, 304-14.
- Weede, E. (1987) Interaction Effects in Cross-National Studies. *Quality and Quantity*, 21, 361-375.
- Yough, S. N. and Sigelman, L. (1976) Mobi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stability: a note of reappraisa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9, 223-32.
- Yough, S.N. (1981)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1, 1-48.

